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

SUMMER VOLUME, 2009

邓正来 主编

中國社會
科學輯刊

夏季卷

2009年6月（总第27期）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

SUMMER VOLUME, 2009

邓正来 主编

中國社會
科學輯刊

夏季卷

2009年6月（总第27期）

 復旦大學出版社

為
了
中
國

任
總
愈



学术委员会名单

主 编

邓正来

主编助理

程 农 吴冠军

学术委员

林毅夫	周国平	许倬云	林毓生
张维迎	孙周兴	童世骏	姜义华
许纪霖	何光沪	马 敏	黄宗智
王 焱	俞吾金	汪 晖	张曙光
葛兆光	季卫东	桑玉成	史晋川
陈嘉映	汪丁丁	时殷弘	陈平原
秦亚青	张 军	周其仁	葛剑雄
赵汀阳	林尚立	高 毅	郑杭生
陈弘毅	邓晓芒	张小劲	徐 勇
钱乘旦	陈 来	陈维纲	纳 日
徐 贲	姚 洋	张旭东	宋新宁
杨念群	郝雨凡	王铭铭	许章润
秦 晖	任剑涛	周晓虹	王缉思
蔡 昉	邓正来		

主办单位：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目 录

(2009 年总第 27 期)

卷首语：重新发现中国	邓正来	1
主题研讨：重新发现中国(二)		
周晓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心态的变迁——有关中国经验的另一种解读		1
杨光斌 制度变迁的路径及其社会科学价值		12
常向群 “个人—社会—国家三分法模型”及其案例浅析——“江镇”的消失与“庙港社区”的崛起		33
学术专论		
陈 来 情性与礼义——荀子政治哲学的人性公理		43
刘清平 从儒家悖论看正当对善的优先性		55
邹立君 司法权能：法律程序理论的一种概念创作		64
学术综述		
刘 倩 统合主义与中国研究：文献综述		75
孙国东 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述评复旦高研院“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国际圆桌论坛		94
何 雨 陈 雯 “半乌托邦化”：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面相——基于知识社会学的审视		99
论坛：“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国际圆桌论坛		109
【主编按语】		109
林尚立 中国政治研究中的价值与事实		109
杨光斌 中国经验与政治学理论的适用性问题		111
顾 肃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112
张小劲 政治学研究方法与中国政治学		114

桑玉成	关于我国政治发展战略的思考	117
徐 勇	农民政治行为的经典模式与超越	118
陈明明	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学科、领域与问题	120
李 强	关于民主的理论思考	123
贾庆国	对“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的若干思考	125
郭定平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解释学视角	127
郎友兴	“结构性情景下的构建”: 一个分析中国地方政治变迁的框架	130
胡 伟	中国政治发展: 理论分析与理论问题	133
周光辉	政治学群体的专业化是提升中国政治学水平的主要路径	135
商红日	关于乡村的故事: 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的谱系学思考	136
郁建兴	重新思考中国公民社会及其发展路径	137
徐斯勤	对于中国大陆政治学发展的初步观察	140
 海外专论		
Jean DeBernardi	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里重建传统——探求全球化和 宗教及传统文化现代性的理论	142
Terry Flew, Greg Hearn and Susanna Leisten	全球创造性经济中的 另类知识产权体制	147
Ronald V. Bettig	版权与文化的商品化	156
萨拜因	现代化的自然法理论	165
 书评思考		
韦 森	探究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的深层原因——评林毅夫教授的 《经济发展与转型: 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	177
郑 戈	世俗时代的诸神对话——评查尔斯·泰勒的《一个世俗时代》	182
杨国庆	权利与功利主义——读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	190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往期目录		196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稿约		198

卷首语：重新发现中国

邓正来

在当下全球化的世界结构中,不仅作为中国社会科学之认识对象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这种认识本身所赖以凭的话语系统亦需要根据当下中国的立场进行重构——否则我们将没有基本的哲学根据去谈论所谓“中国”社会秩序的正当性问题。因此,“中国”既是中国社会科学的认识对象,又是其思想根据;换言之,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判准只能是“根据中国”。这意味着西方思想家,甚或中国先哲的思考绝对不能代替当代中国人自己的思考,西方学者,甚或中国先哲的答案也绝不是当代中国人自己的答案。因此,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加强对中国问题本身的深度研究和理论关注。为此,我们必须从那种因“西方化倾向”所导致的“中国之缺位”中解放出来,重新“找回”或“发现”中国。这里的“中国”绝不是1978年以前或更为久远的中国,而是与其有着历史性关联的世界结构中的当下中国;这里的“中国”也不只是地理或人口意义上的中国,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中国,而是体现并承载着中国人之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的中国。显而易见,这里所讲的“中国”绝不是意识形态视野中的中国,亦不是中国传统知识视野下的中国,更不是西方知识视野下的中国,而毋宁是有待我们运用各种理论资源予以认知并建构的一个伦理性的文明体。

为了引导中国学者加强对中国本身的理论研究,我们特设立了一个常规性的栏目:“主题研讨:重新发现中国”。本卷集中刊发的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视角对不同中国问题展开了深度研究:周晓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心态的变迁——有关中国经验的另一种解读》一文从“中国体验”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心态变迁的轨迹,并解读了当下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呈现出鲜明的“边际”特征:即传统与现代的抗衡、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杨光斌《制度变迁的路径及其社会科学价值》一文则运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提出了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国家的三条制度变迁路径,即英国—美国的商人阶层主导模式、法国—德国—日本的官僚体系主导模式、俄国—中国的政党组织主导模式,并根据这些制度变迁的基本经验提出了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和政党中心主义。常向群《“个人—社会—国家三分法模型”及其案例浅析——“江镇”的消失与“庙港社区”的崛起》一文则以一个中国社区城市化进程(从“江镇”到“庙港社区”)为个案、以“个人—社会—国家三分法模型”为分析工具解读了当下中国的社会关系结构。中国社会是由个体、家庭和各种不同的单位为基础网络所构成,中国的社会关系是以“人情”为基础的,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中国政治制度看似非民主,但内在体系的灵活性使上下左右各种关系得以沟通,当国家、社会和个人在关系上出现冲突时,其特定的人文环境能提供某种机制,使各方在虚虚实实的磨合中创造出新的机遇。毋庸置疑,这三篇文章都是值得肯定的进行中国深度研究的理论尝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心态的变迁^①

——有关中国经验的另一种解读

◆ 周晓虹^②

内容摘要：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转变的同时，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也发生了显著的嬗变。经过 30 年的社会转型，现时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呈现出鲜明的“边际”特征：即传统与现代的抗衡、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但从总体上说，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理智和成熟、越来越开放和多元、越来越主动和积极，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30 年来中国人民经历的这场社会心态的巨大变革是现在越来越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中国经验”的一部分，或者可以干脆将其称之为“中国体验”，它是 30 年的改革开放带给 13 亿中国人民的主观感受和心理积淀，并因此在精神层面上赋予“中国经验”以完整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改革开放；社会心态变迁；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

自 1978 年开始的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整整 30 年的历程。在这 30 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国民生产总值(GDP)从 2 650 亿美元增长到 3.6 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位居世界第三的国家，而且我们通过制度的建设、民主法制的完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正在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迈进。进一步，经过这 30 年的巨变，在整个社会发生结构转型的同时，中国人的价值观、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或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心态，同样也发生了令人惊异的转型。像社会结构的转型一样，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变化不仅范围广、影响深，而且因其前所未有的创造性和独特性在给中国人民五千年的精神嬗变历史打上鲜明烙印的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向现代的迈进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心理范本。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将 30 年来中国人民经历的这场社会心态的巨大变革视为现在越来越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中国经验”(China Experiences)^③的一部分，或者干脆将其称之为“中国体验”(China Feelings)。以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及其感受为核心的“中国体验”，是 30 年的改革开放带给

① 本项研究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反哺：科技进步与社会变迁中的代际关系”(02BSH022)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② 作者简介：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③ 李培林：《东方现代化与中国经验》，载苏国勋主编：《社会理论(第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

13 亿中国人民的主观感受和心理积淀,它在精神层面上赋予“中国经验”以完整的价值和意义。

一、中国人的传统社会心态及其近代嬗变

社会心态是不不断演进过程中的社会的主观精神状态,因其变动不居和现实可感而常常成为社会变迁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在常见的社会科学表述中,社会心态常常与价值观相提并论,这是因为无论是价值观还是社会心态,都是一个社会共同的精神现象或主观表征,并且广义的社会心态也常常包含了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不过,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也有相互区别的一面:前者是社会成员用以进行价值判断的根本观点,并因此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深蕴性;后者则是一种弥散而变动的社会心理状态,是价值观赖以形成的一般心理基础。

长期以来,由于关注个体和小群体研究的心理学家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君临天下^①,导致“社会心态”一词在现代社会心理学中基本处在边缘位置,它“并不是一个积累了很多成果的领域”^②。在对社会心态研究感兴趣的社会学家中,我们一般可以发现,他们都着重强调了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宏观、动态及与重大社会历史变迁的关联等特征。比如,杨宜音提出:“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理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③;周晓虹认为:“在那些重大的社会历史转型时期,都会伴随着社会心态的转变和重塑”^④;马广海更是直截了当地辨明:“社会心态是与特定的社会运行状况或重大的社会变迁过程相联系的”动态社会心理现象^⑤。我们认为,在讨论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社会心态的变迁这一主题时,恪守上述核心特征不仅具有准确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早在 1886 年,恩格斯就说过:“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⑥。

要准确阐释 1978 年以来中国社会心态的变迁,我们首先要回到 30 年前,甚至传统中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上去,因为这不仅是我们 30 年来精神嬗变的起点,也是判别今天的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不可或缺的参照系。自 1840 年西方入侵而导致中国近代以来的嬗变开始,尤其是自包括现代心理学在内的近代科学从西方传入以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以及所谓“国民性”就一直成为中外学者谈及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时津津乐道的主题之一^⑦,并且至今仍然构成了诸多中国学者的学术旨趣^⑧。

从最为简略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从影响传统中国人的经济生活方式、制度结构和文化氛围入手,讨论

① 周晓虹:《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危机——个体主义、实验主义与实证主义批判》,《社会学研究》,1993 年第 3 期。

② 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 4 期。

③ 同上。

④ 周晓虹:《文化、价值观与社会心态》,摘自李培林、李强、马戎:《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9 页。

⑤ 马广海:《论社会心态:概念辨析及其操作化》,《社会科学》,2008 年第 10 期。

⑥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45 页。

⑦ 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8 年版;鲁迅:《鲁迅全集》(18 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 2000 年版。

⑧ 李亦园、杨国枢:《中国人的性格》,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翟学伟:《中国人的脸面观》,台北桂冠图书公司 1995 年版;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在讨论传统中国社会的性质时,能够发现,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会论及这样四个方面:即农耕社会、封建皇权、宗法制度和儒家伦理。进一步,可以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的这些基本特征在几千年中确实从不同侧面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具体说来:①在有6000多年历史的中国农耕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它不仅阻碍了商品或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导致了国民性格中勤俭耐劳和冷漠无知、坚韧和保守的两重性;②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皇权统治,给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社会心理都打上了抹不去的烙印,使得中国人具有鲜明的权威主义人格,或表现为面对强权时的安命不争,或表现为大权在握时的残忍无情;③同样有数千年历史的宗法家族制度,使得中国人缺乏自我主义的情绪表达和普遍的社会关注,他们讲究人伦关系、推崇忠孝礼义,但却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兴趣、缺乏公德心,以致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①;④在上述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了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伦理,它所宣扬的核心内容就是封建等级制度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家族制度,而它所推崇的“仁爱观”、中庸之道以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观”,既造就了中国人仁爱慈悲、中庸谦恭、安贫乐道的一面,也使中国人常常摆脱不了虚假伪善、随波逐流、明哲保身以及“君子不器”等恶习的侵扰。

变化出现在1840年。在这一年的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这个古老帝国封闭的大门,在来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示范面前,中国被迫踏入现代的门槛,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农业文明在向自己十分陌生但却充满生机的工业文明做出让步之后,也开始了向后者的缓慢但越来越迅速的转变。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废除科举、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一件件巨大的历史事件,改变了近代中国的走向。尤其是1919年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和宗法制度宣战,并明确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否定,从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制度层面,进一步引申到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层面。随后的文学革命和提倡白话文运动、批判传统人格和改造国民性的主张,造成了传统人格和社会心态的坍塌。此后,伴随着古老的中国向外部世界的被动开放,沿海地带首先开始从传统经济中剥离出来,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发展,并形成了一系列与内地相对立的特色:物质和文化上都置于西方的示范效应之下;经济以现代商业和现代工业为主轴;文化上向工商社会的价值观念迁移;租界的存在使行政和司法具有中国和西方双重主权和标准;社会具有面向世界的全方位的开放性质^②。如果不是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中国社会的近代变革无疑会向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进一步推进。

1949年的革命,再度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但是,一场以反对封建和殖民文化为目标的革命,在其胜利后的近30年间却形成了更为坚固的传统或者用华尔德的话说“新传统”^③,这却是当年的革命者自己也预料不到的事情。在1949—1978年的近30年间,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业学大寨和“文化大革命”,这些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制度性变革和广泛的社会运动,在相当的程度上左右了中国人民的期望与选择,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的改变发生了诸多积极的影响,但也造成了许多消极的后果。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人民在这30年间因上述重大社会事件所激发出的“革命”热情与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有很大的差别,但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现代的。革命的胜利推翻了皇权,但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7页。

②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4—145页。

③ Walder, Andrew,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却没有扫清以高度中央集权和个人崇拜为核心的封建主义的阴霾；革命的胜利推进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样制约了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发育；革命的胜利铲除了血缘家族统治，但无所不包的单位制和农村人民公社，在限制人们的流动和迁徙自由之后，也弱化了他们的创造性和竞争意识；最后，革命的胜利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垮了儒家封建伦理和刚刚萌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但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却束缚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在这种社会氛围的左右下，一个有 10 亿人口的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高度政治化，同时又高度同质化或曰“去个性化”的社会心态。而从大跃进直至“文化大革命”，一系列世所罕见的政治癫狂，都是这种社会心态的直接产物。

1840 年后的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受着中国原有的历史传统和西方后来的现代辐射的双重影响。这样一种带有历史判断色彩的话语所具有的隐含之意是在这 1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传统也不会因为一次甚至一系列革命而消失殆尽，有时传统甚至会借“革命”之名卷土重来。其实，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直到今天为止，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与社会心态的嬗变和重塑过程中，旧有的传统仍然常常体现出了巨大的现实力量。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嬗变轨迹

历史是延续的，但不同的历史事件对人的生命历程和精神世界的影响是不同的，这又使得人们的历史感是断续的。纵观 30 年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过程，我们可以以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里程碑，将这 30 年的嬗变粗略地划分为六大阶段。

传统价值观的断裂，这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嬗变的第一个阶段。造成中国传统价值观断裂的真正原因，是“文化大革命”这场由中国人集“编、导、演”于一身的历史大悲剧。这场悲剧不同于 1840 年后每每由帝国主义的侵略、干涉所导致的近代中国社会的一次次动乱，因为它使中国人“痛定思痛”之余第一次有可能将“反思”从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转移到自己文化肌肤的毒瘤之上。“事实上，只有这种‘不可推卸’的‘自我反省’，才可能产生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的文化批判，也才能造成几度欲断未断的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真正断裂。”^①断裂首先出现在青年一代身上，因为这些怀着“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目标的一代率先投身于伟大领袖倡导的“文化大革命”，随后又最先遭到了这场“大革命”的无情抛弃。因此，在十年浩劫刚刚结束之际，他们即以“伤痕文学”的形式对整个十年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种批判不仅唤起了整个民族对这段历史的深刻反思^②，而且借助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力量，直接酿就了足以导致传统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发生断裂的巨大震颤。

传统价值观的断裂的直接后果是价值观的空白状态，这是嬗变的第二个阶段。对扭曲、窒息、摧残人的灵魂和尊严的外在社会力量的批判，震塌了传统价值观这堵中国文化的“老墙”，也不可避免地使人们暂时身陷于精神世界的荒原之中。整个社会出现了一种由于旧的偶像破灭、新的人生目标尚未确立而产生的迷惘感和失落感。尽管这种迷惘感和失落感由于 1980 年《中国青年》杂志所刊发的潘晓的来信——“人生的

① 周晓虹：《试论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青年界》，1988 年第 1 期。

② “伤痕文学”的代表者之一、作家刘心武在纪念“文革”中被迫害而死的 100 多个作家时，以一种深邃的目光追问道：“为什么在我们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投身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昌盛的文艺事业，却还要作好牺牲性命的思想准备？”（刘心武：《向母亲说心里话》，载《上海文学》1979 年第 12 期）。这说明，许多人对“文革”悲剧的思考已经从毛泽东个人的独断专行深入到制度和层面。

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以及其后主要由年轻人参加的关于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大讨论,而被当时的人们理所应当地归结为年轻一代的社会心态。但在事实上,当时的年长一代在他们几乎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所遭受的空前劫难之前,其所感受到的迷惘和失落远甚于年轻一代。

嬗变的第三个阶段是现代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萌生。催生现代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力量来自改革和开放两个方面:其一,就改革的力量而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导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使得农村经济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这样的背景下,198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提出了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在这一基础上,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并决定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二,就开放的力量而言,由于世界文明浪潮的波及、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不仅1984年的中国掀起了一场“现代化”的学习热潮,人们也普遍经受了“全球意识”、“第三次浪潮”和“新技术革命”等现代观念的冲击。在改革和开放两股力量的推动下,在相当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中间开始萌生了富有现代气息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他们开始渴望能够主动地介入,而不再是被动地依附经济生活和社会事务,开始积极地从商、从政、从事任何能够自觉发挥个人才能、提高生存价值的工作;想名、想利、想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留下自己的足迹。一时间,“深圳速度”、“步鑫生”、“‘傻子’年广久”、“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成了人们谈论的“热点”,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观念更新”也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在文化与教育领域,“异化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文化热”以及“文凭热”也是一浪高过一浪,这不仅缓解了改革开放之初年长一代知识分子由于“和西方学术界长期隔离……跟不上他们在这30年里的变化”而产生的“苦恼”,而且推动了中国学术界的发展和观念更新。进一步,在沿海开放城市,年轻一代甚至开始同一些陈旧的观点展开了直接的交锋:比如,1988年,蛇口、深圳和北京等地的青年就公开对当时的几名闻名遐迩的“青年导师”的作用表示怀疑,并对他们所宣扬的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

嬗变的第四个阶段是顿挫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第三个阶段的必然结果。在新价值观开始萌生的第三个阶段,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矫枉过正的危险,因为传统的价值观虽然已经发生颠覆性的断裂,但孕育全新价值观的社会环境并没有完全形成,而拂面而来的改革开放之风却使相当多的人开始变得浮躁。加之随着改革的深入,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不断暴露出来,诸多新事物泥沙俱下,它们既可能使一部分人兴奋,也可能使另一部分人不满意。比如,社会政策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而经济上的“双轨制”则为部分权势阶层先富起来创造了条件。这样,在“相对剥夺”的社会心理机制的作用下,许多人的社会心理天平失衡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整个社会竟形成了一种“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复杂社会心态。这种社会心态形成了结构性的张力,而一些突发事件则成了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的导火索。自此之后的三年顿挫中,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转变不但停顿下来,而且陷入了新的迷惘和困惑之中。

接下来的第五个阶段可以称作是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嬗变的复苏阶段,它的标志十分清晰,就是邓小平1992年2月的“南巡讲话”。在此之前,作为“六四风波”的对应物,中国社会再度出现了“左”的思想潮流。有人认为,这场风波是阶级斗争的最大反映,因此反和平演变是当务之急;也有人认为,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是孕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土壤,而“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桥头堡。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提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必须坚持搞经济建设,搞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这不但稳定了人心,更重要的是引发了随后而起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体制改革热潮。同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并通过其后的《宪法》修正案固定下来。至此,市场经济

的大潮在中国大地上不可遏止地奔腾开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重新进入复苏阶段,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心态开始孕育而生。

不要低估 1992 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冲击。美国《时代》周刊曾数次将邓小平的头像刊登在其封面上。1979 年,当邓小平的头像第二次刊登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时,这家杂志说:“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能够来个 180 度大转弯,如同让航空母舰在一角钱硬币上转圈?”而 1992 年的南方巡视则让邓小平的头像再次出现在这家杂志的封面上,文章写的则是“航空母舰”在 13 年里的第二圈^①。从 1992 年开始,这第二圈走了五年。1994 年,我们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市场经济的热潮深刻地影响到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在当年度我们完成的流行语评选中,下海、炒股、申办奥运、第二职业、大哥大、大款、发烧友、发、打的和老板名列前 10 位,充分显示了 1992 年后中国社会的基本景况^②;而同期完成的另一项研究则表明,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人的价值判断呈现多元化的趋向、代际之间的差异变得更为明显、隐私权开始受到尊重、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变得愈加宽容,但在人们旧有的道德观发生裂变的同时,全新而清晰的道德观尚未形成^③。

最后,我们以 1997 年为界,将其后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划为第六个阶段,或者称其为发展期。1997 年之所以会成为这一时期的起点,是因为在这一年的 2 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撒手西去,而这一年 9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将沿着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从 1997 年开始,一晃又是 10 年过去了。在这 10 年或第六个阶段中,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嬗变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没有再出现过改革开放前 20 年中出现过的大起大落,中国人民的社会心态变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稳健从容。我们认为,邓小平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塑造了一个民族成熟的社会心态——她不再会因自己的领袖人物的交替而出现动荡不安,而这恰恰是现代公民社会建立的基本前提。

三、边际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群像

边际人(Marginal Man)也可称为“过渡人”或“边缘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这一概念的内涵最初是由德国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赋予的。齐美尔不仅在《陌生人》中论述了与边际人十分类似的一种特定的心理和行为模式^④,而且他本人实际上就长期扮演着一种“异乡人”或“陌生人”的边际角色。接着齐美尔,1928 年,罗伯特·E·帕克发表《人类的迁移与边际人》一文。沿着齐美尔的思路,帕克将边际人形象地比喻为文化上的混血儿,他们寄托在两个不同的群体之中,但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他们的自我概念是矛盾的、不协调的。用帕克自己的话说,边际人“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在这两个世界中,他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外来者”。不过,这种边际性,不仅是一种负担,同时也是一种财富。因为“相对于他的文化背景,他会成为眼界更加开阔,智力更加聪明,具有更加公正和更有理性观点的个人。‘边际人’相对来说是更为文明的人类。”“正是在边际人的思想中,由新文化的接触而产生的道德混乱以最显著的形式表现出来。也正是在边际人的内心——那里正在发生文化的变迁和融合——我们可以最佳地研究文明和进步的过程。”^⑤

① 李海鹏:《激情与宁静:邓小平的最后 5 年》,《南方周末》,1997 年 2 月 8 日。

② 周晓虹:《时尚现象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1995 年第 3 期。

③ 郑杭生、郭星华:《当代中国价值评判体系的转型》,《社会学研究》,1995 年第 5 期。

④ Simmel, Georg, “Stranger”, In Simmel, Georg,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0.

⑤ Park, Robert E., Human Migration and Marginal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28(33).

我们曾将边际人划为两种类型：其一是处在两种社会形态的转折点或者说是两种时代交界处的特定人格，就像当年恩格斯称但丁是“中世纪最后一个诗人和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这是所谓历时态边际人；其二是处在两种文化接壤处的特定人格，他们由于国际联姻、出访、留学、移民等原因而生活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中，因此又称共时态边际人^①。

我们可以将历时态边际人称之为“过渡人”，而将共时态边际人称之为“边缘人”。其实，无论是过渡人还是边缘人都是边际人，其间的区别只是在前者是文化转型的结果，在后者是文化交融的产物。但是，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和与外部世界的文化交融常常是一种相伴而生的现象：一方面，我们的文化因与外部尤其是西方文化的交融而发生或加快了变化；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化因变化和转型更增添了对外部尤其是西方文化吸收的紧迫性和包容性。因此，在整个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各种文化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又常常以比以往的社会快百倍、千倍的速度发展的现代社会，边际人确实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转型人格，甚至可以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社会成员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孕育着边际人人格的萌芽。

早在 1958 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D·勒纳就通过对中东地区的现代化过程的研究得出结论：如果一个社会中有许多人都成为“过渡人”或“边际人”时，这个社会就开始由传统走向现代了。在他和后来的另一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看来，“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灵的状态：进步的期望、成长的倾向以及使自我适应变迁的准备……要走向现代化，就必须在人格上有所调整，即要具有一种‘心灵的流动’及‘移情能力’”^②。在勒纳眼中，边际人是置身于“传统—现代”连续统上的人：他既处在传统之中，又置身于传统之外；他既跨进了现代的门槛，又未完全投身于现代的怀抱。与此相应，他的行为也受着“双重价值系统”的支配，他渴望现代的刺激，但又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的制肘。

1996 年，叶南客在论述“边际人”时，曾将现时中国人的人格和社会心理特征归结为一种积极的“人格分裂”或“二元人格”。这种“二元型的人格，在历时性上身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是个‘过渡人’；在共时性上又身负相异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个‘边缘人’”^③，它是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或者说是转型或过渡社会给“边际人”烙下的最深刻的标志。如果说“边际人”真的准确地刻画出了现时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群像，那么这种二元化特征就是“边际人”的最本质特征。我们认为，只要我们能够将这二元特征视为一种连续统，这种非绝对的两分法就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合适的分析构架。我们也可以按这一思路，论述现时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二元性”。

(1) 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二元性，表现出了传统与现代的颀颀。传统与现代这一对主题，已经缠绕了中国人 100 多年。显然，如上所述，如果我们不将传统和现代视为相互对立和排斥的两极的话，或者说如果我们认识到任何社会既不存在纯粹的传统性，也不存在纯粹的现代性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将这 100 多年来的历史视为“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或者视为传统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④。这样一来，虽然传统和现代仍是一对相互颀颀的主题，但 1919 年“五四时期”讨论的传统与现代和今天已经有了相当的区别；而今天的中国人所以更为现代，也就表现为他们不再将传统

① 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32 页。

② 参见 Lerner, D.,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8, p. 73; 英格尔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③ 叶南客：《边际人：大过渡时代的转型人格》，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15 页。

④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8 页。

和现代视为绝对对立的两极,也不会为了“恭迎”现代而将传统打翻在地。在今天的中国,人们已经看到,传统与现代虽然仍有发生冲突的可能,但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也是能够共存共生的。不仅社会心理学家通过研究证实,传统和现代的心理特征是能够同时并存的^①,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推行的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和民间传统文化确实在许多地区都展现出了互为依托的现象: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为民间传统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民间传统的社会网络 and 人际关系在地方工商业的兴起与社会互助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②。

(2) 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二元性,反映出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理想之所以还会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是因为中国社会在不断地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这30年来的进步,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希望;但是,现实又令人不满意,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眼界的不断开阔,人们对生活产生了更高的要求。当然,经过30年来的嬗变,中国人不再会固执于某一个极端。在面临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时,他们既不会因屈从现实而放弃理想,也不会因固守理想而无视现实。相反,他们往往会力求在两极之间寻求某种兼顾。2000年初,中央电视台曾经播出了根据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名著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保尔·柯察金这样的英雄人物依然引起了年轻一代的共鸣。同年进行的一项对北京高校学生的调查表明,大学生们在对美国微软帝国的创始人比尔·盖茨顶礼膜拜的同时,依旧对保尔·柯察金保持了足够的敬意。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更倾向于将盖茨视为现实世界的榜样,而将保尔视为精神世界的偶像^③。与此相似,另一项调查表明,在北京青少年的择业观念中,理想和现实也一直处在一种有限度的张力之间:他们最崇拜的是科学家,但他们最想当的是企业家^④。理想与现实之间既有落差,他们又对这种落差抱以宽容之心,说明一种多元价值取向已经成为中国人行为选择的标尺。

(3) 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二元性,体现出了城市与农村的对峙。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L·沃思就指出过,“城市与乡村在当代文明中代表着相互对立的两极。城与乡各有其特有的利益、兴趣,特有的社会组织和特有的人性。它们形成一个既相互对立、又互为补充的世界。两者的生活方式互为影响,但又绝不是平等互配的……随着城市的影响不断地向广大农村渗入,农村人也在被改造的过程中,两者之间的差异最终是会逐渐消失的”^⑤。在中国,城乡分治多年,加之城乡之间的差别一直十分巨大,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人格模式:都市人格和乡村人格。前者是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一致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具体表现为精明、开放、享乐,自我取向,行为方式上的异质性、积极进取、业缘本位;后者则是与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吻合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具体表现为敦厚、耐劳、封闭,他人取向,行为方式上的同质性、消极自保、血缘与地缘本位^⑥。其实,人格特征上的城市与农村的对峙,并不仅仅发生在市民和农民之间,每一个具体的人也都可能同时存在这两种不同的人格和行为特征。因此,有的市民在行为方式上可能更“乡村”一些。比如,他们不遵守交通规则、不爱护公共卫生,因为他们本质上尚不适应同生共济性更强的城市生活。同理,有的农民在行为方式上则可能更“城市”一些。比如,在我们的研究中,苏南的周庄农民为接触现代工业文明付出的代价较小,并因此形成了适应变迁的“秩序感”;而温州的虹桥农民在建立个

① 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6页。

② 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0页。

③ 唐钧:《关于保尔精神与盖茨现象的思考》,《青年研究》,2000年第5期。

④ 纪秋发:《北京青少年道德状况调查报告》,《青年研究》,2000年第2期。

⑤ 帕克等:《城市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75—281页。

⑥ 叶南客:《边际人:大过渡时代的转型人格》,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页。

体所有的乡村工业的过程中付出了较高的心理和社会代价,但也获得了高度的个人自主性和效能感^①。再比如,在李培林等人的研究中,由于进城以后获得的利益在不断增长,“农民工并没有因为较低的收入水平和经济社会地位而表现出消极的社会态度,反而呈现出预料之外的积极社会态度”^②。

(4) 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二元性,体验到了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上的东西方冲突始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的进入颠覆了中华帝国的“天朝”心态。紧接着,1870 年的洋务运动推动了西洋器物文化大规模流入中国;20 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又使得科学、民主、人道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开始了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背景不能不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上留下二元性的结构特征,这也是造成现时中国人的边际性的主要成因之一。

西方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的,东方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或是家族主义的^③,或是情境或关系主义的^④,新中国成立以后则是集体主义的。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争论^⑤,但大多数人都认为,西方文化崇尚个人的自主和独立,他们在社会互动中也具有平等和民主的行为模式;而东方文化强调以家庭或家族为中心,强调服从权威,无论是家庭、家族还是国家权威,概莫如此。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家成为唯一的利益主体,国家的利益更是取代了个人、家庭和家族的利益,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开始主导人们的行为。作为集体主义精神之典范的“雷锋精神”,就倡导“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党拧到哪里,就在哪里闪闪发光。这种集体主义,片面强调集体的至上性和绝对性,严重忽视个人的存在,不能实际地满足个人的正当需求,最终必然迫使个人去关心自己,脱离集体去谋求自己的发展,使得集体主义最终也只能徒具其表,成为一种“虚假的集体主义”^⑥。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 1992 年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上述“虚假的集体主义”开始向“真实的集体主义”转变,力求在集体和个人之间寻求新的平衡。这种集体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现实的价值取向,乃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具有兼顾个人与集体的两重性: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以追求经济主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这就必须尊重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是社会分工和高度社会化的产物,它需要每一个社会主体间的分工合作,这又为集体主义留出了生长空间。可以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在充分尊重个人利益和个人选择的同时,“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⑦,就一定能够走出价值冲突和价值危机的困境。

四、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变迁趋势

我们用了万余字的篇幅,论述了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和社会心态,论述了 1840 年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 1979 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这 100 多年,尤其是这 30 年以来,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的嬗变是巨大而又深刻的,从我们叙述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总体态势来看,

①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317 页。

② 李培林、李炜:《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社会学研究》,2007 年第 3 期。

③ 参见 Parsons, Talcott, *Social System*, Toronto, Ontario: Collier-Macmillan, 1966, p. 96; 杨懋春:《中国的家族主义与国民性格》,载李亦园、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性格》,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④ 参见许烺光:《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比较》,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Ho, D. Y. F. (何友晖), “Psychological of Collectivism: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hinese Case and Maoist Dialectics”, In Echenberger, L. H., W. J. Lonner & Y. H. Poortinga (eds.), *Cross-Cultural Contributions to Psychology*, Lisse, Netherlands: Swets & Zeitlinger Press, 1979.

⑤ 相关争论,可以参见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51 页。

⑥ 姜锡润、王曼:《论社会转型时期价值冲突的根源与价值观重建》,《武汉大学学报》,2005 年第 2 期。

⑦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3 页。

与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相一致,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也在发生着传统向现代的嬗变和跃升。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延续了近30年,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又有哪些新的趋势呢?

第一,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理智而成熟,他们的社会心理承受力将进一步提高。社会心理承受力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社会心理结构系统,是因改革开放而生的一个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甚至这一概念本身就产生于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①。因为改革开放,因为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导致了社会利益格局的重组和利益关系的变化,以及利益分配方式的改变;也因为改革开放,新的社会或利益阶层出现了,不同阶层间的矛盾和冲突产生了;还因为改革开放,我们原有的社会体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弊端暴露出来,各种腐败现象和犯罪行为也大为上升;这一切都使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受到冲击,导致了人们的精神震荡和心理失衡,所以自1978—1989年间的改革初期人们的社会心理发生了剧烈的动荡,1988年的经济动荡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都为此写下了注脚。但是,自1992年后,尽管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前10年,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劳动人事制度、工资制度、住房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都发生了巨大的改革或变化,这些改革或变化在造福一大批人的同时也影响到一部分人的生活,但整个社会却并未因此出现危机的征兆。这说明人们对改革进程不再抱以盲目的乐观态度,问题意识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素养,并且学会了参照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角度来全面地看待问题^②。尽管在目前的大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相对稳定与政府对各种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能力提高有关,也与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网络能够提供一定限度的心理舒缓和社会支持有关,但中国人社会心理承受力的提高同样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二,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开放和多元,他们对各种外来文化和其他亚文化的接受能力也不断提高。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转折过程。和1840年的被动开放不同,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十分高涨,但这种积极的接受态度在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以及日本首相三番五次参拜靖国神社后曾出现了短暂的变化,但最近几年随着“奥运会”的来临和召开,中国人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对外民族的文化接受形成了相映生辉的局面。2000年对中、日、韩三国青年社会意识的一项比较研究表明,同日、韩两国青年相比,中国青年不仅具有高度的民族认同感,而且还具有较为强烈的为国家富强做贡献的愿望^③。相似的多元文化心态也表现在不同的代际之间,我们的研究发现,同改革开放早期年长一代和年轻一代之间的矛盾、对立和冲突相比,现时的两代人之间已经形成了更为融洽与和谐的代际关系,一种被我们称之为“文化反哺”的代际沟通方式正成为中国社会不同代际之间的沟通桥梁^④。

第三,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主动和积极,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中国在世界主流国家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他们对国家的未来也越来越充满信心。2000年进行的一项对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市民的调查表明,大多数中国人对新世纪的中国发展充满了信心^⑤。中国人自信心的提高,并不仅仅是精神嬗变的单纯结果,更重要的是它是以中国社会30年来的经济变革和国力增强作

① 张大钧:《关于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几个基本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② 沈杰:《中国社会心理嬗变:1992—2002》,《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③ 君塚大学等:《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中日韩青年的社会意识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④ 周晓虹:《文化反哺:变迁社会的代际传承》,《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2期。

⑤ 沈杰:《中国社会心理嬗变:1992—2002》,《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